

论道

建设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的路径

■ 陈晓晨

随着各高校按《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启动研究生培养工作,新版目录中新增的区域国别学正式成为兼具教学培养与科研职能的一级学科。我们应该建设什么样的区域国别学,怎样建设区域国别学,已经成为摆在我国区域国别研究者面前的一道具有紧迫性的“必答题”。笔者认为,应当从服务对象、任务目标和理论方法三个维度,分析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的建设路径。

编者按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随着中国积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和深度参与全球治理,区域国别研究的国家战略意义愈加凸显。去年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发布《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确定将“区域国别学”纳入交叉学科一级学科目录。当下,这一目录已正式启用,区域国别学布局与发展进入快车道。如何回答好时代之问,画好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工笔画”?本报今刊发相关研究成果,以飨读者。

以正确的理论方法指导区域国别学建设

建设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还要回答“怎样建设”的问题。首先,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建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区域国别的客观存在既有符合历史规律的普遍性,又有基于各自区域国别历史的特殊性,是整个区域国别学知识体系得以构建的哲学基础。要认识到世界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的,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以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看问题,认识世界,指导区域国别学科建设。

在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建设,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全面理解“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在我国同世界的关系中看问题。

在方法路径上,区域国别学建设要以全面系统的思路,克服学科本位主义束缚,积极寻求不同学科、不同方法、不同背景人才的交叉融合,尤其是外国语言文学、国际关系学和世界史这三个学科的交叉与相应方法的融合。我国的国际关系学和世界史已经形成了针对各区域与重点国家研究对象的较为普遍的覆盖,研究路径与教学传承已较为成熟。相比之下,在外语学科基础上发展区域国别研究,推进外国语言文学与区域国别学融合发展,目前尚有较大潜力,是未来可期的增长点。

人才是建设区域国别学的主体,人才培养是区域国别学长远发展的可持续动力。要克服门户之见,不拘一格降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解决目前区域国别学人才建设遇到的支持力度不够、发表相对困难、晋升通道欠缺等问题。要将创新型科研与创新式人才培养结合起来,在高校日常教学培养过程中探索“以研带教”模式,充分发挥学生的能动性,充分发掘学生在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两方面的科研潜力,以“卓越科研”带动“卓越育人”,通过高度契合实践需求的互动式教学实现教学相长、教研并进,为区域国别学的知识传承提供保障。

当下的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也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亟须建立覆盖全球的知识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正当其时。明确了服务对象、任务目标和理论方法,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的未来将更加广阔。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国别与区域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成果)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明确区域国别学的服务对象

建设区域国别学,首先要明确“为什么”和“为谁”的问题。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应当是中国的区域国别学最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当以此统领这个新学科的建设发展。

首先,这符合区域国别学的内在规律。区域国别学是一门旨在针对域外特定对象国家或区域进行知识生产、提供与传播的学科,观察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相互作用,主动性和互动性是区域国别学相较于其他学科的特点。其他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观察者自身不会对研究对象的性质产生本质影响。而区域国别学是一门兼具科学性与实践性的学问,其研究内容反映了观察者在特定背景下对特定域外研究对象的战略意图,观察视角决定了研究内容,其研究成果反过来可能对研究对象产生影响。可以说,区域国别学有国界,研究者有祖国。因此,“谁研究”“为谁研究”就成为区域国别学的首要问题。

其次,这符合区域国别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区域国别学的早期发展与19世纪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列强的海外利益密切相关。现代区域国别学发端于美国,其背景是“二战”期间美国国家力量向全球扩展,但美国学界对海外知识的储备相对匮乏,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官方直接出面支持高校和研究机构开展适应战争需求的海外研究。“二战”结束后,美国势力进一步向全球扩展,由此产生了区域国别研究“向全球覆盖”的需求,政府、基金会、高校与智库等并力,形成美国区域国别学的整体框架和组织机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日本经济的崛起,在日本官方和半官方机构的大力推动下,日本的区域国别学也快速发展起来,其重点研究对象与日本跨国企业的需求高度契合。可见,区域国别学是“大国标配”,服务于国家意志是西方区域国别学兴起的共同背景。

最关键的是,这符合区域国别学的现实需求。现在,中国的崛起已经到了这个阶段,与美日等国大力发展区域国别学的时代背景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都面临域外知识供给难

以满足海外利益需要的困难。当然,中国的区域国别学服务于和平目的,服务于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于构建新发展格局。一方面,国家应当是驱动和支持区域国别学建设的主要力量;另一方面,区域国别学研究者要自觉提高站位,以服务国家为根本动力,构建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研究主体。

以中国视角遴选任务目标

“研究什么”是一个学科发展的中心问题。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的任务目标应当设定为:以中国视角对特定研究对象进行了解和重点研究。中国视角是遴选任务目标的标准。

从研究领域上看,区域国别学是关于特定区域国别的政治、经济、社

会、军事、人文、法律等领域的综合知识,天然具有学科领域交叉的综合性。《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更是明确了区域国别学作为交叉学科的定位。因此,以改革创新的思维突破现有学科划分是区域国别学建设的关键。这有利于尽快形成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理论体系,并以此实施区域国别学研究和人才培养。

另一方面,开展区域国别学建设不应“撒胡椒面”,而是要有所侧重。应当树立从国家需要出发遴选重点研究对象的原则,以研究对象之于我国战略利益的相关性为评判研究价值的标尺。具体说,战略重点国家、我国“大周边”区域、“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国家等应当成为研究重点,特别是对我国大力推动的区域和跨区域合作机制,例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澜湄合作机制(LMC)、喜马拉雅区域合作、中国-太平洋岛国跨区合作和印度洋岛国区域合作等,要集中力量研究。要重视与我国战略利益相关、但长期被学界忽视的研究

对象。随着“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的提出,太平洋岛国研究、加勒比岛国研究和印度洋岛国研究等传统上的“冷门”区域国别重要性提升,也应当成为重点关照对象。

从学科目标上看,区域国别学既是致力于解释特定区域国别知识生产,也是由国家推动的旨在实现特定目标的知识供给,还是面向年轻人和国内外广大受众的知识传播。在此过程中,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学术研究与应用研究应当相辅相成,携手并进,不可偏废。缺少学术基础研究,政策应用研究就是无源之水;缺少政策应用研究,学术基础研究就是无的放矢。应当以学术基础研究作为区域国别学的支撑,以政策应用研究作为区域国别学的动力。对于学术基础较为薄弱但现实需要又较为紧迫的区域国别,不能有按部就班的心态,而是要积极作为。可采取以政策研究带动学术研究的路径,推动该领域跨越式发展。我国的太平洋岛国研究是一个以此路径跨越式发

展的案例,其经验值得总结。

加强国际交流与对话也是区域国别学的重要任务。但是,目前这方面的工作亟待加强。中国学者在一些涉我重大问题上屡屡失声,在国际学术话语权塑造中尚未起到应有的作用。当然,造成这种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国际交流与对话能力不足是主观原因,对参与国际对话的激励不够是制度原因。因此,提升中国区域国别学研究者的国际对话能力,下大力气促进国际交流,开展公共外交,是新时期我国区域国别学建设亟待解决的“瓶颈”问题。

此外,区域国别学并非孤立的知识,而是具有全球的整体背景。我们处在全球治理时代,应当具有全球视野,考察对象国或区域与全球治理进程的互动,是对当代区域国别学的时代要求。如果忽视这一点,就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在这个意义上,需要将中国视角与全球视角相结合,共同遴选区域国别学的研究任务。

锐见

深化区域国别视野中的城市研究

■ 张鹏

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城市不会是,也不能是简单的、平面式的外国城市介绍,将城市放入区域、放进国别,在主权高度上看中国之外的区域、国别城市发展,也许是当下我们对国外城市开展研究的新使命。

尽管“区域”和“国别”的研究场域内不乏城市的身影,但城市本身尚不是区域国别研究的关注重点,鲜见将城市研究与区域国别研究相关联的研究成果。在城市研究领域,目前最为“靠近”区域国别研究的当属外国城市研究,而区域国别研究鲜有单独讨论城市话题。至于全球城市研究,在理论范畴上首先是经济学,其次是全球治理,单独与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对话还较少。但客观上,区域国别研究涉及大量的具体城市,因此,城市研究与区域国别研究可以交叉融合。未来区域国别研究中拥有可能的城市研究增长点。为找准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城市定位,本文试分析如下:

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城市不是简单的外国城市介绍

在中国学术界,区域国别研究被认为拥有“外性”——关注中国之外的研究对象,“广性”——尽可能涵盖研究对象的各个方面,是以中国为

主体,观察外部世界的新学科。我们要考虑到,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城市,实际上已被推上在区域和国别发挥作用的地位。因此,一定要强调其从城市角度发挥着哪些区域影响和国别影响。

“区域国别研究应该是对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地区的全面了解”,这一论断其实就已经包含了全面了解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区域城市的要求,但区域、国家的数量总是可以控制在一个两位数或百位数的数量级,而城市则往往不能做到这样一个层面的数量级。因此,从研究“单元”的角度而言,对国家和区域的全面了解,还是可以体现主权高度的综合概括性。而城市则因其本身的数量和解决城市问题的研究需要,则主要还是偏向相对细节化问题(如城市规划与建设、城市交通、城乡一体化发展等)上的研究,具体的城市场景是不可或缺的,对主权高度相关问题的讨论极其有限。

这里提出的“主权高度”问题,不是一时起意的。历史上,欧美的区域国别研究发端于近代早起欧洲列强海外探险和殖民扩张活动,成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冷战期间的全球争霸与区域争夺,以致区域国别研

究有“帝国之学”或“大国之学”的特殊性,研究内容上也可以分广义和狭义。但无论如何划分,服务于大国战略,从“大国主权的高度和水准上”看所研究区域、国别的域内之真,是题中之义。

做好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城市,这种“主权高度”和城市问题必须相结合。城市研究议题中有哪些是直接服务于主权事项的呢?我们经历的这个时代,城市的全球联系已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一般城市虽然不拥有主权(城市国家除外),但涉主权事项却相当多元。垂直体系上的国防、国家安全、出入境管理;经济、社会、文化重点领域的国家布局、布点;国家级的大科学装置、大型基础设施,都需要“嵌入”具体的城市“装置”之中,加之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资源的充分汇集。使得这些城市发挥诸如“国家中心城市”“国家级都市圈”的具体作用。这些城市的影响力,可以说处于国别区域研究所直接关注的范畴了。

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城市不会是,也不能是简单的、平面式的外国城市介绍,将城市放入区域、放进国别,在主权高度上看中国之外的区域、国别城市发展,也许是当下我们对国外城

市开展研究的新使命。

如何开展将城市放入区域、放进国别的研究

将城市放入区域、放进国别开展研究,首先,在学科意义上,要注意辨析“城市科学群”的30多个独立学科中,到底有哪些容易对接进入区域国别研究领域,哪些又不太容易放在区域国别范围内。其实,和区域国别研究有类似性,城市研究也是一个相当交叉的学科,甚至是学科交叉尤其突出的学科。当区域国别研究和城市研究“握手”之时,交叉又交叉的学科之内,是这个科学群的牵头学科。正如“城市学是独立的综合性学科,它包含在城市科学群之内,是一个牵头学科”的论断。在“城市科学群”中,既有自然科学学科,如城市建筑学、城市地理学、城市规划学、城市园林学、城市设计学、城市生态学;也有社会科学学科,如城市社会学、城市经济学、城市管理学、城市人口学等

等。“区域国别科学群”由区域国别学抓总,不断产生理论引导,而区域国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语言、宗教、历史、法律”“新技术、网络空间、虚拟社会、元宇宙”等等,使得区域国别研究充盈起来,在学术资源上高度交叉融合,相互启发。将城市放入区域国别,就会有区域国别的城市地理、区域国别的城市规划、区域国别的城市社会、区域国别的城市经济、区域国别的城市管理、区域国别的城市人口等,这可以形成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以课题、书系、咨政报告等形式呈现。

其次,对城市研究中既有的涉及区域、国别研究资源进行整理、组合、重列等。在城市研究领域,有大量的国别城市发展数据、全球城市指标排名(通过全球城市指标排名会比较容易地分析区域范围中的城市),而且因为这些排名的新闻效应强,传播频率高,往往都在长期更新。如城市研究领域的几大综合性排名:全球城市与世界城市研究网络(GaWC);森纪念财团“全球城市实力指数”(GPCI);科尔尼全球城市指数(GCI);全球城市竞争力研究(GUCP)等,都已具备相当影响力,可对分项进行的区域国别城市研究在“主权高度”和“数据广

度”上发挥积极作用。国别城市发展数据方面,收集整理各国主要的城市研究机构对国内城市开展的研究报告,也可以形成有效数据库和数据集,以助研究所需。

第三,以区域国别研究为目的的外国城市实地调研。区域国别研究中最具挑战性,同时也最具吸引力的部分莫过于开展域外实地研究。以区域国别研究为目的,站在为大国对外交往服务的基础上,不断扎实开展面向区域国别重点城市、“一带一路”节点城市的田野调查,是将城市放入区域、放进国别开展研究不可替代的内容。域外实地的区域国别城市调研,还可以充分发挥城市研究中的城市社会学、都市人类学功用,不断探索新的区域国别城市研究知识生产模式。

未来城市研究与区域国别研究能否形成范式互鉴?在这个问题上,首先看城市研究的未来方向。未来城市研究面向“信息技术影响、大数据应用及以人为本需求三者交织的领域发展”。但是,在数据驱动还是以人为本驱动这种范式问题上,城市研究学界仍是争议不断。反观区域国别研究,在站稳大国之立场的基础上,将作为“包罗万象的学问”和“针对某一国家和区域、某一专业领域、某一具体问题的学问”组合成的整体,集中推进。从区域国别学“以国别和区域为研究对象”的主权高度出发,城市研究也许就不会纠结于数据驱动或以人为本驱动问题。但人文关怀、以人为本需求,最终落脚到人类——那些鲜活生命的集合的发展和进步上,应当也是区域国别研究在范式驱动上的终极追求。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教授)